

大众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困境

黑晓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兰州 730070)

摘要:大众文化以其绝对的优势销蚀着道德生活以及道德教育的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瓦解着人们对可能生活的终极意义的追寻,从而失去了道德精神和信念,失去了对德性品质的培养。文章在对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特质的大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道德生活与道德教育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大众文化;道德生活;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2-0094-05

在我国悄然兴起并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只经过了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却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所表达出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

一、大众文化及其批判

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生产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和利用的文化消费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1]。在此,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艺术、宗教、哲学与商业、政治、消费、娱乐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满足人们被动、虚拟的需要。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商品性与文化性也就成了大众文化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特质。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大众文化追求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把获取最大利润作为根本目标。大众文化“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捕获’大量受众、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大众文化

的运作核心。”^[2]大众文化在本质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娱乐倾向和感性愉悦。正因为如此,“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3]以“欢乐”为标榜的大众文化正试图完全放弃精英文化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以感性的愉悦为核心的文化幻象。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也许是文本的欢乐所无法弥补的。”^[4]在这个技术迷信和商业扩张的时代,文化基本上丧失了作为人类生存内在基础的意义深度,片面发展为形象的游戏,使形象崇拜代替了审美精神的人文理想,成为个体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形象成为个体生存欲望的对象,成为自我失落的个人存在的虚假证明。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文化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低俗的传播品位与“弱智化”、“审丑化”内容的大量涌现。当这种商品化的文化仅仅为了“卖点”而想方设法激发受众的欲望、去娱乐理想、文化时,它所承载的道德责任、真诚其实已

收稿日期:2010-09-04

作者简介:黑晓佛(1978-),男,甘肃靖远人,编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教育。

网络出版时间:2011-3-2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328.1401.041.html>

趋于虚无,在如此疯狂地追求感性快乐的虚无狂欢中,道德的意义和价值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甚至厄运。

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去意义化的文化,它所关注和追求的只是个体的心理满足和自我满足。大众文化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它强调的是感性、快乐和满足,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完美和境界的提升。大众文化的这一特点使其以一种更加普遍化的引诱和权力技术,把个体导向背离精神价值和理想,使他们放弃道德追求与共同价值,进而关注个人化的感性、快乐和满足,这使个体逐步滑向自私化、平庸化和物质化的泥淖,从而使生活中的选择呈现出非道德化的倾向。随着我国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对道德教育的控制越来越走向实用化和功能化,这本身就减弱了主流意识的道德控制,而且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将人们的生活进一步导向非精神化和非价值化,这使大众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日益严重。

二、大众文化与道德及道德教育

文化影响道德,道德反映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讲,道德是一种文化现象,道德教育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由此,道德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是社会文化生活整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道德教育必然要以文化的传承、变革和创新为旨归。“一般认为,道德具有两重文化功能,其一是维系功能,其二是变革功能。道德的维系功能就是保持文化的相对稳定;道德的变革功能就是,当文化不能满足主体和时代的发展需要时,人就要改变它,重新创造一个文化世界”^[5],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品质。同样,文化更是传统习俗、规范、伦理道德和精神素养的载体。文化决定着个体的道德认知和思维范式,关乎个体道德品格的养成与行为的选择。因此,文化对于道德教育,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又有消极的阻滞作用。腐朽、没落的文化必然延缓、阻滞道德理念的更新,甚至还会助长、加剧道德行为的失范,最终促成道德危机的生成;而先进的文化必然会拓宽道德教育的研究视阈,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扩充道德教育的文化资源,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有益于社会道德进步。文化与道德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文化与德性是相互建构的过程。文化在于人的德性,文化以语言、习俗、规范、制度等有形和无形地塑造着德行,成为决定德性的重要因素;德性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又规范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6]这是对文化与道德关系的生动反映和典型概括。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道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文化

大众时代的到来,使道德必然反映出了某些大众文化的痕迹。任何一个社会、学校的道德和道德教育都不可能游离于这种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之外。随着大众文化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它必将严重地冲击甚至颠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个体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的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道德行为的多样性,势必都会成为影响和制约当前道德教育的深层次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大众文化之于道德教育的注解与意义,一如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如何正视大众文化的实际,并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采取切实的方法和策略推进自身发展,已成为道德教育不可规避的现实课题^[7]。

三、大众文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困境

任何道德和道德教育,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因而难以摆脱文化背景的制约和牵引。大众文化背景下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主要表现在其对道德教育的冲击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大众文化与道德主体的解构

福柯认为,现代理性假设了一种规范的和普遍化的道德主体,或一种先于任何社会条件、社会活动的主体,这种道德主体是自足的,被设想为自由和自律的,有一种先于社会的、高于社会的内在本质或原发意志。但是这种自足的主体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主体是在历史框架中被构成的,主体正是在这些历史和社会场域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正是这样,道德主体性是在社会权力、知识和真理的场域中,在道德话语和实践领域中被建构起来的。主体不再具有道德自主性和道德自足性的先验根据。所以在福柯看来,道德主体是自我的看管者,他在与社会的限制关系中运用自己的自由空间看管自我、表演自我。他的道德实践是以积极的方式构成自我的实践,不是规范的内化,也不是彻底的脱离规范。自我看管是一种道德生活的反省实践。福柯解构了理性主义推论式的道德主体,把主体归结为个人道德的实践者^[7]。大众文化把人训练成一个纯粹的娱乐主体和消费主体,而不是道德的实践者,因此,个人生活的伦理性被置于娱乐性和消费性之下。个人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主体,由此也使生活者的含义变异成了娱乐和消费的人。娱乐和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表征,同时也成了人的身份象征。在这一背景之下,娱乐性和消费性也随即成为人的一种普遍、常态的人性。在此,娱乐和消费已经在欲望的层面将人归于一种

先于社会、先于历史的统一性。娱乐和消费就这样完成了对作为“自我看管”的道德主体的解构。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娱乐性和消费性实现了它对道德主体的彻底解构,使个人的生活完全游离于现实理性之外,个人的生活过程被设置成为一种虚假的、非道德性的、不受任何干预的、为所欲为的、欲望满足过程。以娱乐性、消费性以及虚假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使道德主体迅速的死去,至此,人成为商品的奴隶,也成为被物所引诱的牺牲品,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

(二)大众文化与道德意义的消解

“大众文化所倡导的是人们关注现下的自我,直接面向现存的生活境遇,从而在其作品和活动中消解着理想和崇高精神。”^[8]大众文化以诱导大众对其产品的消费为目的,向大众传输着符合大众生活趣味、与大众的现有认识水平相当的内容。另外,大众文化的影响是建立在大众的无意识和自发性上,而非建立在大众的高度自觉上。以娱乐性和商品消费性为主要特质的大众文化往往在无意间把大众引向只注重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的快乐之路,从而使人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关注主流的意识形态。因为此时人们有何种意识形态已经不再重要,人们只关心是否获得了当下的快乐以及消费的欲求。大众文化只有商品消费、只是感官享受,而没有主流意识形态,其保障的是大众的现实利益和欲望诉求,这使其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商品消费和感官享受的欲望诉求侵蚀、消解着社会大众的品味追求、理想信念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大众主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从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从中心逐渐走向了边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征的道德被放逐和遗弃。

大众文化的娱乐化、感性化、商品化等特质,将人们的生活导向了平面化和功利主义倾向的没落之路,“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关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回潮。”^[9]大众文化只关注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始终秉持着一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在虚幻的追求和满足中漠视甚至否认着终极价值的存在和道德理性的意义。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消费,是享乐。消费性和娱乐化造就的直接后果是“人的现代性发展放弃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追求。它在一极显现出个体现代性的多元性、选择性;另一极则显现出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10]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去意义化的文化,它所关注的只是个体的心理满足

和自我满足,它强调的是感性、快乐和满足,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完美和境界的提升。在娱乐化和消费化的精神驯化中,个人把美好生活理解为“感性愉悦”和“自我满足”。人的幸福主要体现为由物的价值及其象征所表现出的欲求的满足,追求美好生活即意味着追求感性、快乐和欲望。而这一切都与品味追求、理想信念无关,与人的道德同样无关。在这里,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几乎完全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娱乐和消费精神的新的品质观。因为道德专注于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而不是欲望的满足,因此使道德在娱乐和消费欲望的满足面前显示出了它的无能和无用……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和消费性消解了普遍的价值观念而代之以符号的普遍性,它瓦解着人们对可能生活的终极意义的追寻,从而失去了道德精神和信念,失去了对道德意义的理解。

(三)大众文化与道德理性的退场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和社会词汇表》一文中指出了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11]文化的这种通俗化理所当然的使其与思想、意义的承载与传达划清了天然的界线,并因此省去了它不想也不必去承担的不属于它的道德教化和思想提升的重任。随着文化向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思想、意义、审美和艺术都已脱去了自身的神秘外衣,仅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缀而存在着。另一方面,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的制约,大众文化主动逢迎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并在这种无原则的逢迎中不断降低着自身的文化品位,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意义都统统被抛弃。正如杰姆逊所说:“美感的产生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中。”^[12]物化倾向和欲望追求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大众文化塑造着文化现实,同时也塑造着人对现实的认识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大众文化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日益结合,消费和娱乐不但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演变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地由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文化,而是大众自发的文化形式,是一种适应人们休闲需要并被商品化了的文化形式。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大众文化产品取代了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的空间。由于

大众文化自身的特质,使其在有意无意间总是强化和突出着商品消费功能、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等等,文化中应有的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内涵不断被削弱甚至抛弃。正因此,在大众文化传播中表现出了普遍的拒绝道德追求的倾向,只求感官的享受、当下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使道德虚无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这使人们放弃了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从而也丧失了现实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以至于无理性的潜意识、生命意识、性意识的普遍凸现和毫无约束的泛滥成为生活的常态,而人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却被抛弃和湮灭,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意识便因此成为了大众文化中的主导意识。大众文化强化和突出的是文化形式上的休闲和娱乐功能,以及对感官刺激的追求。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往往只是作为大众文化的装饰而艰难的存在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大众文化在一味追求“感性的愉悦”的同时,渐渐淡化并最终忘记了人的道德意识;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一味追求感官刺激、享乐的同时,逐渐抛弃、贬抑甚至亵渎着道德。在大众文化的喧闹声中,道德似乎成了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其退场已成必然。

四、结语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境遇与大众文化的这些特质相“合谋”,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大众文化是现代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文化需求和文化认同,是普通人的文化实践形式,它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追求,从而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无论是持何种价值观念,处于什么样的利益群体的人,都可以在大众文化场景中出没,追寻自己最为需要的精神产品,从而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缠绵与舒适。大众文化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和“有求必应性”,使其产生就受到大众的青睐和喜爱,甚至狂热的崇拜。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的一呼百应和道德教育的无人问津形成了鲜明对比。

反观当下的教育便不难发现,我们所标榜的教育已从本质上背离了它本真的意义,成了一种在工具理性操作下的功利主义教育,使科学世界教育与生活世界教育严重背离。“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反而在同流推波助澜中,与社会其它方面共同酿成了当前的道德危机。”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指出:“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这使道德教育无法对实际做出快速、准确地反

映,无法对人们关注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无法对人的丰富的、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提供充足的精神养料,使道德教育沦为失信与失语的尴尬境地。

文化的转型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流行价值与主导价值的冲突中,实利最终战胜了理想。这也是这个时代人们不重空谈道德、理想而崇尚物质、实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们实现个体“自救”的最直接、最便捷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认可、接受以及对娱乐和消费的选择又有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大众文化适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也使20世纪以来主流文化“一体化”的文化产生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消费性、娱乐化的文化,按照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解释,它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即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13]它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正是因此,大众文化堂而皇之的成为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立的文化形式,丰富和满足着大众的欣赏口味和需求。这使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成为可能并最终冲破了泛道德主义的束缚,把道德从社会的中心抛向了社会的边缘。在文化呈现出“众神狂欢”的“繁荣”景象的同时,也宣布了道德的死亡。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人性得到了解放,但传统的意义世界却被迫解体,从而导致了道德的断裂与虚无,使人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娱乐道德观、消费道德观取代了善性道德观、德性道德观。由此,造成了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的失落,这也引发了道德理想与信仰的沉沦。

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独立个体的形成与发展,但对主体性的张扬也使个人主义在不断膨胀中走向了极端。为追逐个人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最大满足,人的贪婪攫取性、极端利己主义完全凸显出来,这为反对任何道德约束和主张放任自流以及彻底释放本能的道德虚无主义、非道德主义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人们不再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不再追求道德的品格和价值,而只是极力标榜与众不同的个性张扬,道德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拒斥道德信仰,崇尚虚无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表征。传统道德与道德传统的断裂最终导致了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颠倒,共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和心灵的空虚、焦虑、绝望与道德意

义的丧失共同构成了当代人的精神底色。

大众文化重视的是生活的娱乐性和消费性,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和生活的目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不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之内。大众文化以其绝对的优势销蚀着道德生活以及道德教育的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瓦解着人们对可能生活的终极意义的追寻,从而失去了道德精神和信念,失去了对德性品质的培养。对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特质的大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纵然不能使我们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对其进行彻底地抵制,但却意味着我们应该努力寻求一种相对平衡和相对和谐的出路,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道德教育的新出路^[14]。

参考文献:

- [1]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6.
- [2] 王一川.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0.
- [3] 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
- [4] 蒋述卓等.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0.
- [5] 鲁洁.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34.
- [6] 王国银.德性伦理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97.
- [7] 钱广荣.优良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先进[J].滁州学院学报,2010,(6):1-3.
- [8] 金生铉.保卫教育的共性[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45-46.
- [9]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2.
- [10]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
- [11] 扈海鹏.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7.
- [12]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和社会词汇表[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56.
- [13] [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29.
- [1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责任编辑:万东升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HEI Xiao-fo

(Gansu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Gansu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 culture is ero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ral lif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its absolute advantage. And in the process the pursuit of people to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the feasible life is being collapsed to lose the spiritual and moral beliefs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virtual quality. The author analysis its impact and challenge to the moral life and mor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al to the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er as the main character.

Key words: popular culture; moral life; moral education